

经济改革面临制度定型关键时期

□ 张俊伟

回顾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历史发展的轨迹是摇摆的,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未来制度将更趋稳定成熟

改革开放的“前30年”,是逐步引入市场机制、积极融入世界经济的时期。改革开放极大释放了社会活力。当然,在发展的道路上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表现在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公众不安全感增加。在下一步发展方向上,“左”和“右”两种思潮的争论和对立趋于激烈。

当前则处在“新30年”,特点是试图把“前30年”和“后30年”调和,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向“中间道路”回归,意味着最高决策层对改革模式的认知更加清晰。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单向的“市场化”改革进

入尾声,意味着制度的定型和“传统意义”上“改革”的结束。做出这样的判断,符合邓小平当年对改革开放时间节点的构想。邓小平曾对我国改革进程做过如下设想:“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这一设想如今已经得到确认。党的十九大重申:“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全面深化改革……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现行体制具有很强生命力

如果把考察视角进一步拉长,我们可以看到另一幅图景。近代中国积贫积弱,饱受西方列强凌辱。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国人终于认识到:国家强弱的背后是制度之争。变法也好,革命也罢,都是为了建立现代社会制度。

正是在对君主立宪制、英美共和制乃至苏维埃制度的比较、鉴别中,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工人、农民选择了苏俄社会主义道路。但坚持“集体主义至上”的计划经济和与此相适

应的社会集中管理体制存在抑制社会活力的一面。因此,无论是前苏联、原东欧国家,还是中国,在制度上都面临经济僵化、活力下降的问题。自1978年以来,我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引入市场机制并最终决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整个社会转型的角度看,我国的改革任务显然还远没有完成: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功能发挥尚不充分、政府职能转变也不到位的条件下,“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的弊端已充分暴露出来;其次,政治体制乃至社会管理的变革,明显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需要加快相关领域改革以扭转改革进展不平衡、相互掣肘的现象。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大转型的中途,距离改革的彼岸还很远。就像经济发展正处在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时期一样,当前我国的改革事业也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期。但恰恰是这个处于“山腰上”的过渡体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首先,它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计划经济时期过分压抑个人自由的弊端;其次,强大的国

有经济和“强政府”不仅与当前“集体主义”导向的官方意识形态相适应,也与“当官要为民做主”的传统意识形态相适应。有哪位主政者不希望能够大显身手以实现自己的“家国情怀”呢?再次,“强政府”特征也与当前公民意识严重不足、社会中介绍织发展严重滞后的现实相适应;最后,它以优异的经济 development 成就证明了自己存在的合理性。这就使得当前推进改革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局面。一方面,有大量的深层次问题需要解决,另一方面很容易出现改革动力消失的现象,很容易出现向“前30年”“借”思维方式和政策工具的现象。这就使处于“爬坡过坎”期的改革事业面临“不进则退”的现实风险。

改革旨在完善而非颠覆

在许多人看来,改革的目标还应“激进”一些。比如,应大幅收缩国有经济布局,进一步推动“国退民进”,把政府职能收缩到必要限度内,并且应推动政治体制做出相应变革。很显然,决策者对经济体制(乃至整个社会体制)改革目标的选择偏离了上述人士的预期。而决策者选定当前的改革目标,也是当前社会环境使然。

改革的目的是完善而不是颠覆。我们的改革是由上层社会发动的,其目的不是为了颠覆,而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我国的改革一开始就被定位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曾明确指出:“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种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因此,改革应该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应该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从这一点出发,近年来要求“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两翼”并进深化改革

毋庸置疑,当前在推进改革的进程中仍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出现上述局面,有对改革目标存在认知差异的原因,有改革触及切身利益的原因,也有改革方法不得体、改革措施落实不到位的原因。要充分挖掘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需要牢牢把握住推动治理现代化这个关键:

——反思“顶层设计”,以正确方式推进改革。所谓顶层设计,顾名思义就是最高层次的改革设计,它考虑的应当是政府、市场与社会如何分工合作以形成新体制的问题,应当是执政党、人大、政协、政府如何分工合作以推进改革的问题,应当是改革的成本收益在不同群体间如何公平分担(分享),乃至如何建立补偿机制以减少改革阻力的问题。如果偏离上述三个基本问题,把重心放到各专业领域改革的决策上,就很容易回到过去由行政主导推进改革的传统路子上,并且会因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使改革手段与改革目的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加剧。

——以提高政府效能为目标,掀起公共管理革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是经典的纯粹市场经济模型,而是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而且,社会主义的社会属性决定了我国政府必然是“大政府”。但也存在“政府失灵”的问题。政府和市场结合的边界,就在于两者效率的比较。“大政府”得以稳定维持的前提,最根本的还在于政府运转的高效率。应当全面总结“大部制”“绩效预算”“绩效考评”的经验教训,以“服务客户、提高效能”为内容掀起一场公共管理革命。

——推动“依法治国”,全面落实“四个全面”。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法治社会建设。在“四个全面”的治国理政方略中,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改革一道,被视为推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两翼”。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声 音

把握两个不同抓住三个核心

□ 王东京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目标。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在理论上我们要把握两个不同;在实践中要抓住三个重点。

全面准确地领会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科学内涵,首先要弄清两个不同。

一是经济体系与产业体系不同。所谓经济体系是指由“产业体系、创新体系、协调体系、开放体系、体制机制”等五个子系统构成的一个大系统。我们不能望文生义,简单地将经济体系等同于产业体系。

二是现代化经济体系与传统经济体系不同。两者的区别,就在于是否符合新发展理念。符合新发展理念的经济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

《学习时报》发表的评论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就如何用新发展理念引领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提出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等六大战略举措。落实这六大举措,应抓住三个核心:

第一个核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显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以往的政府调结构,而是强调从生产端发力,通过改革解决结构性问题。十九大报告明确强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怎样通

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筑牢实体经济?近期任务是继续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而长远目标,则是增强供给结构适应需求变化的灵活性,实现供需动态平衡。

第二个核心:坚持以创新发展为动力。一个国家的经济就好比是一艘在大海里行驶的航船,有动力才能前进。长期以来,经济学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经济发展要靠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拉动,此观点最初是来自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里不去评论凯恩斯《通论》的对错,但有一点很清楚,“三驾马车”是需求侧的拉力而非供给侧的驱动力。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的着力点是实体经济,发展实体经济要从供给侧驱动。

第三个核心:坚持以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为核心。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特别提出的是,十九大报告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在阐述“坚持新发展理念”时讲的。习近平总书记为何要在这个部分讲?我理解,用新发展理念引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等,都涉及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由此看,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关键。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改革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 毛寿龙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必须

2018年,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人到第40个年头。2017年秋天,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在这个时期,可以说发展依然是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在这个时期,GDP增长依然是重要的,依然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但发展已不仅是GDP的增长,还是发展理念、发展制度以及市场和政府的成长,是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是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实力 and 综合国力的壮大。

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核心是高质量的发展。如果说改革开放近40年我国经济需要的是高速增长,那么新时代经济需要的则是高质量发展。这就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而这些举措的核心还是在于对企业家精神的保护和激发。在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期,政治秩序上必须继续从严治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推进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而在经济发展领域,则必须继续依靠企业家精神。

很多学者认为,企业家精神包括创新精神、敢于冒险和勇于承担风险的精神、合作精神、学习精神、诚信和服务精神。在秩序学者看来,任何事物都是有秩序维度的,而企业家秩序维度的特点是,能够充分发展市场秩序维度,使其得到细分并得到专业化的发展,同时还会利用国家、政府、社会等方面的秩序维度力量,甚至是影响推动国家、政府、社会等方面的秩序维度走向开放的权利秩序,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改革与发展提供秩序维度的支撑。

《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指出,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落在具体政策上,政府要改善投资和营商环境,尊重企业家。给企业家更多的尊重和空间,给创业家更多的鼓励和支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应该成为政府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重要举措。同时,政府还要进一步完善市场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



上海自贸区已吸引4.8万家企业入驻

自上海自贸区运行以来,已吸引4.8万家企业入驻,显示出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体现了实实在在的生产力。图为上海自贸区的航拍照片。

新华社记者 丁汀 摄

□ 郑新立

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体制改革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党的十九大做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历史性论断。为什么说中国经济转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与高速增长阶段相比,新阶段会呈现出哪些新变化、新趋势?我们在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过程中如何抓住机遇,攻关夺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两个一百年”目标挺进?

所谓“高质量发展”强调质量而非速度,强调发展而非增长,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经济需再一次做出明确的路径选择。

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一论断的本质含义,就是我国经济已经从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实现的粗放型高速增长,转

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改善管理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实现的集约型增长。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划时代的变化。

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再纠结于经济增速快一点还是慢一点,而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抓手,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2016年,我国“百强县”以占全国2%的土地面积,6%的人口创造了超过全国11%的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165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6.5%;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1万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9%。纵观“百强县”的发展要诀,无一不是从原有资源、投资拉动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向创新驱动的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迎来了全新的发展契机。

高质量发展阶段表现在产业结构上,是由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技术密集

型、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变;在产品结构上,由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产品为主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为主转变;在经济效益上,由低成本、低效益向低成本、高效益的方向转变;在生态环境上,由高排放、高污染向循环经济和友好型经济转变。最终将体现为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居民收入得到较快增长。

增长仅指经济总量的扩张;发展的内涵则更为丰富,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我国已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因此,经济发展要从单纯追求总量扩展,转变为适应人们更高标准的、更加多样化的需求。

据《人民日报》报道,历史地

放弃速度偏好 注重发展质量

看,经济发展在重复“繁荣—衰退—复苏—增长”波浪式前进的同时,以科技、人力资源等要素进步为新动能,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实现向上的总趋势。“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我们直面新时代主要矛盾,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必需选择和紧迫任务。

现阶段的主要矛盾要求我们放弃速度偏好,重视发展质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重要论断,是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相一致的。

目前,我国能源、原材料消耗总量偏大,单位GDP能源消耗偏高。“粗放型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这样的增长模式难以持续。

近几年,华北、华东地区出现大面积雾霾天气,一些与环境污染有关的疾病发生率上